

文化的那些事儿让日子有滋味

舞跳起来,书读起来,球打起来,日子一天天美起来。站在新年的门槛上回望过去一年,公共文化领域的任何点滴变化,都在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里泛起了幸福的涟漪。

日前,文化和旅游部盘点2019年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工作,呈现了过去一年来公共文化领域的亮点。这些亮点,既是对公共文化领域重点改革任务的落实,也是对人们美好生活期待的回应。

1.文化空间遍地开花

北京市西城区佟麟阁路85号,是始建于1907年的中华圣公会教堂的旧址。2019年的某一天,周围的居民突然发现,这栋以前无人问津的老旧建筑已变身名为“模范书局·诗空间”的“最美书店”,成为北京新的网红打卡地。过去这一年,在很多城市,像“模范书局·诗空间”一样,突然“长出来”的文化空间真不少。比如,在重庆主城区,出现了24家24小时开放的城市书房,这些城市书房每天在图书馆闭馆后,继续在夜间为市民提供相应的服务;在温州,2019年全市已建成城市书房88家、百姓书屋61家、文化驿站70家。

这些文化空间,或在街角,或在弄堂里,或在小巷深处,总之离群众越来越近。一出门,下楼,就能闻到文化的气息,享受到优质的服务,在城市里正在成为现实。如果说城市里的图书馆、文化馆等大

型场馆是公共文化服务的大动脉,那乡村的文化服务中心就是公共文化服务的毛细血管。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司长李宏说,2019年,文化和旅游部把农村、社区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重点,推动优质资源、服务下沉到基层一线,大力开展群众身边的公共文化服务。截至2019年年底,全国494747个行政村(社区)建成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占比86%。

过去一年,文化空间不仅在房前屋后遍地开花,服务效能也随之大幅提升。近年来,为解决农村地区公共文化设施“沉睡”的问题,文化行政部门对各地近8000个乡镇综合文化站进行了专项治理。

2.“文化菜单”更加丰盛

正如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张旭所言,当前公共文化服务正处在从“有没有”“缺不缺”向“好不好”“精不精”转变的关键时期。过去一年,政府的投入持续加大,社会力量广泛参与,老百姓“文化菜单”上的菜品越来越丰盛。

目前,全国已有12个省级公共文化云平台、100多个市级文化云平台。这种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能够有效促进供需对接,激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接下来,文化和旅游部将依托国家公共文化云,实现各级各类平台融合发展,开展公共文化和旅游产品的网上交易,打造“不落幕的文采会”,满足群众更加多样化的文化需求。

此外,为推动“戏曲进乡村”工作常态化开展,2019年中央财政共投入3.89亿元为12984个贫困地区乡镇配送约8万场以地方戏曲为主的演出,把戏曲大餐送到群众家门口。

3.公共文化服务“走上云端”

最受中国人喜欢的运动是什么?广场舞。有关报道显示,超过4亿中国人有经常锻炼的习惯,其中1亿人锻炼的主要形式是广场舞。不管乡间还是城市,只要温度适宜,天气晴朗,广场舞永远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可是广场舞参与人数众多,受时间和空间限制比较大。2019年,借助互联网技术,广场舞“走上了云端”,不仅解决了时空限制,而且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

在2019年“我和我的祖国”——文化新生活全国广场舞展演活动中,人们只需要打开国家公共文化云、文旅e家、中国文化馆协会公众号,便能欣赏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广场舞表演,还能跟着教学视频免费学跳,该活动在网点击击量达3657万,点赞数达142万,形成了一次广场舞的网络大联欢。

2019年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期间,主办方为网民提供了一个在“云端”进行全景式体验群星奖现场的空间,用新颖的视觉设计、综艺式节目编排、高清直播带来第一时间的内容呈现,不仅展现了基层群众文化的风采,更为观众打

造了身临其境的视觉盛宴。据统计,“云上群星奖”总访问量超过5000万。

公共文化服务“走上云端”,增强了公共文化服务的溢出效应,扩大了公共文化活动的受惠人群,丰富了人们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的形式。有了云端上的公共文化服务,行动不便的老人,不用再为无法到达现场而喟叹,身处异地的游子也可以跟家人一起“走进”艺术现场。

4.台下观众变成台上主角

公共文化服务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群众不仅是台下的观众,也应是台上的主角。

过去一年,更多的人涌进直播平台,对于年轻人而言,拥有一个直播平台的账号,就像拥有微信号一样普遍。吃饭、穿衣、遛娃、旅行……人们将各自的生活日常通过直播展现于外,塑造了一种全新的网络文化景观。

直播的低门槛为普通人参与文化创造提供了机会。虽然各直播平台都有自己的产品定位和一定的美学取向,但它并非不是同质化的,而是完全开放的,它提供了一个充满了张力的文化空间,为多种文化的汇聚创造了可能。直播平台上,一个个90后、00后,勇于展示自己的个性,绽放自己的才华,创造出属于他们这一代人的文化。他们的身上已经褪去父辈的羞涩和内敛,处处散发着新时代中国人的自信。

摘自《光明日报》

养生汇

冬天吃水果不会伤胃

很多人,尤其是老年人和女性群体,对“冬天吃水果”这件事格外小心。他们往往都认为水果太凉,冬季吃会伤胃。但在营养学上,水果并没有凉热之分。而且,对于健康人来说,没有什么水果可以“伤胃”。只要你吃了凉的水果后没有觉得不舒服,那就可以放心地吃。

有人问:冬天吃水果可不可以加热后再吃呢,比如煮一下再吃?水果煮熟后会不会损失营养?

其实,加热所导致的营养损失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多。水果中最怕热的营养主要是维生素C和B族维生素等,但损失一般也不会超过50%;至于其他营养素,比如类胡萝卜素,它是不怕热的,加热也不怎么损失。而且,损失也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了,跟完全不吃水果相比,熟吃水果还是可以获得大部分营养的。此外,水果做熟后,减少了纤维等成分对消化道的刺激,对于消化能力还不是很健全的孩子、老人来说,其实是不错的选择;加热后别有一番风味,没准还可以多吃一点。

摘自《北京青年报》

老人“多重用药”三原则

“多重用药”是指患者同时使用5种及以上的药物。比如,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血管疾病、骨质疏松、慢阻肺等疾病,通常都需要长期使用药物治疗,患者易出现“多重用药”的现象。

此外,老年人容易自行服用各种保健品,导致患者可能同时服用十多种甚至几十种药物,而患者对于药物自身的不良反应、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疾病自身的并发症等复杂的综合情况并不能准确判断,就会引发药物安全问题。

服用多种药物的原则:

第一,受益原则。用药首先是治疗疾病,若没有健康问题,不推荐随意服用“保健药”。

第二,“5种药物”原则。明确药物适应证,相同药理作用的药物可遵医嘱适当调整治疗方案,避免重复用药。

第三,及时停药原则。药物使用要注意个体化,每个人对药物的不良反应不完全相同,一旦出现药物不良反应,必须及时停药,并向医生进行反馈以进行合理调整。

此外,老年人必须坚持遵医嘱服药。

摘自《中国家庭报》

警惕高血压引发脑出血

脑出血是一种常见的脑血管疾病,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脑溢血”,该病发病率和致死率都很高,急性期病死率更高。引起脑出血的原因有很多,在中老年人群中最常见的病因就是高血压。如今中青年高血压脑出血的发病率也大幅提升,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长期的高血压可导致颅内小动脉硬化,逐渐形成微小动脉瘤,当血压急剧升高时,血液可能会从血管壁渗出或直接“顶”破动脉瘤壁,此时大量的血液会“冲”进脑组织,而脑组织又是松软结构,最后就会形成血肿。

高血压脑出血可发生在颅内不同的出血部位,出血量多少不一,因此不同的患者表现出来的症状也是不尽相同。有些高血压脑出血患者在发病前并无明显异常,不过也有一部分患者会出现诸如头晕、头痛、恶心等症状,此时若测量血压可显著高于平时。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一定要密切注意可能出现的征兆,如言语不清或不能言语、口角歪斜、一侧肢体麻木、头痛、剧烈恶心呕吐等,一旦发现类似情形,则要警惕脑出血,必要时迅速就医。

如果身边的高血压患者出现了疑似脑出血的病症,应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患者如有呕吐,需将其头部摆为侧位,如果口腔内有呕吐物,应想办法掏出,以防止窒息;患者出现抽搐等癫痫症状时,要为患者解开衣扣,帮助其平卧;有条件的,可为患者测量血压。

需要注意的是,高血压脑出血患者发病后,不要忙着给患者“喂药”。一方面,脑出血患者可能已经丧失了吞咽功能,强行喂药容易引起窒息而危及生命;另一方面,看似“高血压脑出血”的症状,还有可能是“高血压脑栓塞”,此时做降压处理会适得其反。因此,应等待专业的急救人员来处理。

摘自《北京晚报》

滴水藏海

撕日历的日子

发明台历的人大约是个年轻人,岁月于他来讲是漫长的,所以他让日子在长方形的铁托架上左右翻动,不吝惜时光的消逝,也不怕面对时光。当一年万事大吉时,他会轻轻松松地把那一摞用过的台历翻起,随便扔到什么地方让它蒙尘,因为日子还多得是呢。而对于中老年人来说,看着那一摞摞用过的台历,也许会有人人生如梦的沧桑感。

小的时候,我家总是挂着一个日历牌,我妈妈叫它“阳历牌”,我们称它“月份牌”。那是个硬纸板裁成的长方形的彩牌,上面是嫦娥奔月的图画:深蓝的天空,一轮无与伦比的圆月,一些隐约的白云以及袅娜奔月的嫦娥飘飞的裙裾。

下面是挂日历的地方,纸牌留着一双细眯的眼睛等着日历背后尖尖的铁片插进去,与它亲密地吻合。那时候我每天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撕日历。早晨一睁开眼,便听得见灶房的柴火噼啪作响,有煮粥或贴玉米饼子的香味飘来。这是早起的父亲弄好了一家人的早饭。我爬出被窝的第一件事不是穿衣服,而是赤脚踩着枕头去撕钉在炕头的月份牌。凡是黑体字的日子

就随手丢在地上,因为这样的日子要去上学。而到了红色字体的日子基本上都是星期天,我便捏着它回到被窝,亲切地看它。觉得上面的每一个字都漂亮可爱,甚至觉得纸页泛出一股不同寻常的香气。于是就可以赖着被窝不起来,反正上课的钟在这一天成了哑巴,可以无所顾忌地放纵自己。有时候我起来去撕日历,发现它已经被别人先撕过了,于是就就很生气,觉得这一天的日子都会没滋味,仿佛我不撕它就不能拥有它似的。

被我撕掉的日子有时飘到窗外,随风飞舞,落到鸡舍的就被鸡一轰而啄破,落到猪圈的就

被猪给拱到粪里也成为粪。命运好的落在菜园里,被清新的空气滋润着,而最后也免不了被雨打湿,沤烂后成为泥土。

会有过日子的人家不撕日历,用一根橡皮筋勒住月份牌,将逝去的日子一一塞进去,高高吊起来,年终时拿下来就能派上用场。有时女人们用它给孩子擦屁股,有时候爷爷用它们来卷黄烟。可我们家因为有我那不安分的手,日子一个也留不下来,统统飞走了。每当白雪把家院和园田装点得一派银光

闪闪的时候,月份牌上的日子就薄了,一年就要过去了。心中想着明年会长高一些,辫子会更长一些,穿的鞋子尺码又会大一号,便有由衷的快乐。

长大以后,家里仍然使用月份牌,只是我并不那么有兴趣去撕它了,可见长大也不是什么好事情。待到上了师专,住在学生宿舍,根本没日可看,可日子照样过得一个不错。也就是在那一时期,商店里有台历卖了,于是大多数人家就不用月份牌了。我自然而然地结束了撕日历的日子。

台历有意无意成了我的简易日记本,当然就更有收藏价值了。如果能把幼时已撕去的日历天一拾回,也许已故的父亲会复活,他又会放一条狗进我的睡房催我起床。也许我家在大固其固的那个已经荒芜了的院落又会变得绿意盈门。

但日子永远都是:过去了的就成为回忆。

可它毕竟深深地留在了心底。当我年事已高,将台历的日子看花了,翻台历的手哆嗦不已时,揣揣肯定还在奔月。

摘自迟子建所著《也是冬天,也是春天》

文化中国

汉字字序行序是如何确立的

汉字最初的行款应该是自由的,字序、行序并没有明确的规则。目前出土的大量疑似文字的行款方式,如江苏吴县澄湖良渚古井出土的黑陶贯耳壶,腹部的4个字呈横斜状排列;而江苏高邮龙坑发现的刻文陶片,可以分为两组,4个字的那组应是竖排。

对新行款真正起关键作用的,应是新需求。根据早期汉字的应用情况,我们不难猜测,它就是甲骨文占卜、竹筒记录等活动。所以,能对行款样式起主要作用的主要是两个方向:一是甲骨和竹筒本身,二是活动性质的影响。

“方便说”认为,汉字字形便于竖写,所用的竹筒宜于竖写,这是汉字书写的决定性条件。“持筒习惯说”认为,古人应是席地而坐,左手持筒,置于胸前,右手执笔而书,

正是持筒的习惯性动作决定了字序的下行。这个说法的前提条件是古人必须有竖向持筒的习惯,而这其实是很难确定的。

这样,就剩下第二点,即活动本身。毫无疑问,甲骨占卜活动占据了绝对的“话语权”,在行款基本样式确立中的关键性作用。从目前出土的甲骨文内容来看,它绝大部分是占卜的结果,即神意由甲骨兆相表达出来的文字呈现,是一种来自神灵的从天而降的“天垂象”式的昭示。行款自上而下的字序,从形式上正好吻合这个特点。

甲骨占卜活动的性质决定了行款自上而下的字序,行序呢?从甲骨材料出发,它通常可以分为几个对称区域,为此我们常看到为对称之美而设定的“下行而左”和“下行而右”两种方式,也就是说,行序

是自由的,可见后来行款常单一地以“下行而左”,即行序“从右至左”为主,决定性因素不在甲骨。

对于竹筒,无论是先写后编成册,或是先编成册再书写,从右至左都是比较方便的对,对此,不少学者已有丰富的论证。对于先写后编成册的情况,钱存训先生《书于竹筒》中提到:左手持筒、右手书写,便于写好的简策按顺序置于右侧,由远而近,形成从右到左的习惯。

不过,汉字行款基本样式的真正确立,应是在周代。周代在继承商代的行款中,单纯延续了竹筒行款样式,统一使用字序自上而下、行序从右至左的行款,极少有例外。自此,被沿用数千年的汉字行款基本样式得以完全确立。

摘自《老年日报》

生活新知

负面情绪也有正面作用

100万年前,你是生活在大草原上的直立人,你刚刚看到一只剑齿虎隐藏在灌木丛中。你会立即反应:“哦,那个生物似乎会伤害我,我应该做好准备以防万一。”幸运的是,你的交感神经系统并没有浪费时间。它以超快的速度向全身发出预警,让你做好战斗或逃跑的准备。当然,这个预警会让人感到惊慌。但如果发出的是舒缓和愉悦的信号,那你就不会把危险当真了,对吗?

血流加速以及肾上腺素分泌的增加助你跑回你的洞穴。你生存下来了,可能还十分幸运地找到了伴侣并把你的基因传承下去。

当今世界已经没有藏在灌木丛里的剑齿虎了,但即便如此,恐惧仍能帮助我们生存下去。夜里走在一条漆黑的巷子里,我们会起鸡皮疙瘩;在做有风险的决定时,我们会反复斟酌;当有人凶神恶煞般地迎面而来时,我们会选择后退。

摘自《参考消息》

名流故事

伍廷芳:中国办报第一人

伍廷芳就读的圣保罗书院虽然是教会创办的一所神学院,但是其所设课程已经基本世俗化。早在建院之初,英国外交部就每年向该校提供250英镑,作为港英殖民地政府培养传译员和翻译人员的经费。因而,当伍廷芳经严格挑选被录取为香港高等审判厅译员。至此,伍廷芳开始学习西洋法律。

从1861年毕业涉足政界起,到1874年自费留学英国止,伍廷芳连续在香港生活了13年。在此期间,伍廷芳最值得追颂的是:主持创办了中国第一份日报——《中外新报》。

《中外新报》的创办,是必然与偶然的统一,是偶然与必然的巧合。

香港华人经济势力的崛起,是伍廷芳创办报纸的经济动因。19世纪60年代全球经济呈现出飞速发展的势头,为香港地区经济繁荣提供了契机。北美大陆、澳洲大陆相继传出发现大量金矿的消息后,全球刮起了一阵规模宏大的“淘金旋风”。在发财欲望的驱动下,数以万计的华人纷纷漂洋过海,应招奔赴淘金地。地处东西交通要道的香港成为外运的主要港口。为躲避战乱迁往香港的两粤富绅,利用香港四通八达的航运线,架起了一座座通往世界各地的桥梁,把远洋贸易和中国沿海贸易衔接起来。随之而来的便是滚滚的财源。到19世纪60年代初,在港华人已达8万之众,华人的财富远远超过洋商而成为香港财政收入的支柱。反映华人利益,表达华人心声的第一份报纸——《中外新报》,便在华商大力发展转口贸易的进程中呱呱落地。

《中外新报》是在一个很偶然的情况下创办的。当时,有一个伦敦传道会的牧师罗列特东来中国,此人通粤语,博学多识,曾在港任通事之职,1856—1860年间,为香港风习监督学院,一生著作甚丰。他看见因语言障碍,东西方文化交流极为不便,于是便编了一本《汉英字典》,交给香港《孖刺西报》排印。报社因此制了一副中文铅字,等到字典印完后,中文铅字便无用武之地。1860年,伍廷芳、黄胜等人议决利用这副铅字,出版中文报纸,《孖刺西报》的负责人表示同意。于是,《中外新报》便由此诞生。是年,伍廷芳18岁。

既然事涉黄胜,在此就必须交代一下黄胜的情况。因为长期在外,由于伍廷芳在晚清政坛上、民国风云中蜚声海内外,后来的人们在提及《中外新报》时,往往把功劳全归于伍廷芳一人,而作为该报另一重要创办者的黄胜则渐渐为人们所遗忘。

黄胜(1828—1902),字平甫,广东香山县东岸乡人,生于澳门。1843年来港就读于马礼逊学校,与容闳为同窗。1847年同容闳、黄宽一起赴美留学,入马萨诸塞州孟松学校攻读,一年后因病返港,先后在《德臣西报》《孖刺西报》工作,从事编辑翻译,精通印刷技术。后来转入香港最早的英文书院英华书院任教,继任校长,与英国传教士、著名汉学家理雅各翻译四书五经,对促进中英文化交流贡献甚大。

从黄胜的生平简历中可以发现,1860年《中外新报》创办时,黄胜无论是在年龄上还是在个人经历上都要比伍廷芳占优势。因此,应该说是伍廷芳、黄胜共同创办了《中外新报》。

《中外新报》是作为《孖刺西报》的附刊出版的。最初星期一、三、五出版,后来改为日报。每天下午出版四开一小张,约容4号字15000字,除广告外,新闻约占版面三分之一。另门外南山风报印“行情纸”一页,专门登载货价、船期,随报纸派送,切中商人、市民的需要。年收费3元。因经营得法,报纸销量甚好,民国初年达到全盛时期,销数逾万。后来被龙济光操纵,成为军阀的喉舌,为读者所唾弃。龙济光倒台后,遂一蹶不振,1920年乃宣告停刊。前后存在6年。

伍廷芳将《中外新报》视为宣传西学,启迪民智的基地,他对该报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十多年来,在完成

了一天的公务后,他时常伏案工作到深夜。为报纸翻译资料,确保报纸的质量,即使是在炎热的夏天,也不稍懈。有时翻译完一篇资料已是黎明时分,他便匆匆洗漱完毕,赶往港府法庭,开始新一天的工作。

伍廷芳在主持《中外新报》的同时,还协助陈言(葛亨)创办了《华字日报》。陈言,字善言,号葛亭,与伍廷芳是亲戚,任《德臣西报》副主笔。1878年应驻美公使陈兰彬的邀请,出任中国驻古巴领事。任内,积极保护华侨。1879年后出任开平煤局总办、沪宁铁路总办。1905年8月去世。《华字日报》创刊于1864年,此为香港第二份中文报纸,最初由陈葛亭主持,后由江治、何仲生等接办。该报存在近80年。1941年12月25日,日军攻陷香港时,因不愿受屈辱而停刊。

关于该报创办的缘起及与伍廷芳的关系,《华字日报》曾有过明确的阐述:外观于世界潮流,内察乎国民程度,知非自强不足以自保,非开通民智无以图强,……乃决意创办本报,期以世界知识灌输给国人,以国内政俗告于侨胞。使民智日开,而益奋其爱国之念,此办报之惟一宗旨也。惟其时铅字印机,购办极难。筹备经年,始向教会中之西人,购得铅字一副。……惟印刷机仍缺,不获已乃商于《德臣西报》之主持人,与之合办。……而当时名流,伍廷芳、何启实为之助。

由此可见,从《中外新报》到《华字日报》,仅仅过了4年,中国人办报的趣旨便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如果说,《中外新报》启迪民智,御侮图强还处于朦胧阶段的话,《华字日报》则将这一宗旨渲染得旗帜鲜明,明确无误。“期以世界知识灌输给国人,以国内政俗告于侨胞”,即是有感于西洋文化冲击下,中国社会表现出的“附庸”“愚顽”现象而发,希冀通过报刊这一近代社会的大众传播媒介,唤起国人(主要是殖民地统治下的香港华人)理性地对待西洋文化和中国传统文,“使民智日开,而益奋其爱国之念”。

《中外新报》开启了中国近代报业史的先河,继之而起者如雨后春笋。仅在香港一地,《华字日报》之后,又有《循环日报》(1874年)、《维新日报》(1880年)、《述报》(1884年)、《粤报》(1885年)、《广报》(1886年)、《中国日报》(1899年)、《商报》(1904年)、《广东日报》(1904年)、《有所谓报》(1905年6月)、《新汉报》(1911年)、《华商总会报》(1919年)、《新闻报》(1920年)、《工商日报》(1925年)等。这些报纸的办报思想更加明确,办报形式更趋合理、新颖。无怪乎40年后,伍廷芳欣然说道:“自我们从第一张报纸,以小小的纸张出版,到现在它领导及塑造了公允的舆论。”

事业的接近,趣旨的契合,使伍廷芳与王韬走到了一起。王韬这位中国传统文化的“叛逆者”,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扮演了一个“盗火”的普罗米修斯的角色。其传奇性的经历,更令后世的人们格外着迷。王韬是江苏甫里镇人,1828年11月10日出生,孩童时即显露出过人的天资,熟读经书,但是在科举道路上却是一个失败者,到头来只是一个不名一文的秀才。一连串的挫折、失意,使他对象制及清王朝的统治深怀怨恨。

在香港,王韬主要从事“东学西渐”和“西学东渐”的工作,协助英国传教士理雅各,将四书五经翻译成英文,同时也向华人输入西学,《法国志略》即在此间完成。他还兼任《德臣西报》的子报《近世编录》的编辑。同行的缘故,王韬结识了陈言,并由此认识了伍廷芳、黄胜、何启等人。1874年1月5日,王韬主办的《循环日报》创刊,伍廷芳曾给予了大力支持。

在香港这块特殊的土地上,特殊的文化氛围中,伍廷芳、陈言、黄胜、王韬,这批沐浴在异国文明中的人走到了一起,有别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新型知识群体在此形成。

摘自张礼恒所著《“三世”外交家伍廷芳》

顾颉刚的“两个镜子”

顾颉刚是中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出版过《古史辨》(第一至第七册)《汉代学术史略》《中国疆域沿革史》《尚书》校释译论》等大批有影响的史学著作。他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更是新耳目,曾在学界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于读书,顾颉刚有许多见解,他觉得读书之先“必须养成特殊方面的兴趣,应该精读、略读相结合,还要‘随处会疑’,最重要的是用好‘两个镜子’,“一个是显微镜,一个是望远镜。显微镜是对自己专门研究的一科用的;望远镜是对其他各科利用的。”

依我的理解,顾先生的“两个镜子”应该包括了这样的意思:读书时必须专、博结合。专业书要读细,只有读细才能发现问题,也才可能得出别人忽略的结论。他当年提出的“层累地造

成的中国古史”这个学术观点,就得益于他对史书的用心阅读。他发现:周代人心中最古的人王是禹,孔子时始有尧舜,战国时有黄帝神农,秦时三皇出来了,汉以后才有所谓“盘古”开天辟地的传说。顾颉刚因此推论:“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

不过,一个人要想得到真学问,光是精读某些专业书还不够,还得大量阅读其他学科的书。知识之间是互相联系的,只有对相关学科的东西都有一定的了解,我们的站位才有高度,视野才能开阔,专业方面的研究也才可能做得通透。

读专业书用“显微镜”,是为了发现别人的遗漏;读其他书用“望远镜”,是为了克服自身的狭隘。

摘自《北京日报》